高教前沿

2015 年第 2 期

（总第 7 期）

南京邮电大学高教所主办　　2015 年 4 月 25 日

目　录

高校动态

构筑大类培养和自由转专业的成才通道…… 1

清华大学：敞开创业课堂的大门…… 4

高教视点

高校去行政化须防走歧路…… 7

访李培根教授：大学教育最高境界是心灵的抵达…… 10

理论探索

杨宗凯：高校如何优化资源配置…… 14

大学如何告别平庸…… 15

经典重温

资中筠：大学文科向何处去…… 19

内部资料，仅供参考！　主编：蔡建淮　责任编辑：王燕妮　电子版网址：http ://gjs.njupt.edu.cn

◎ 高校动态 ◎

构筑大类培养和自由转专业的成才通道

南京大学：本科生分三个阶段培养、三种路径发展

实施“三三制”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第一个“三”指学生进入学校后将经历“三”个培养阶段：首先，本科生进校不再戴有专业“帽子”，而是通过大类招生进入“通识培养阶段”，全面提升人文与科学素养；其次，学生完成通识教育并达到专业准入标准后进入“专业培养阶段”，着重提升专业素养和能力；最后，进入“多元培养阶段”，学生可修习多种个性化课程模块，满足自我成长需要。第二个“三”指学生进入高年级后可根据自身兴趣选择“三”种发展路径：首先，学生可以参与各类科研训练或选修本硕贯通课程，为今后继续深造打下坚实基础，即“专业学术类路径”；其次，学生可自主设计第二专业培养方案，使自己发展成为更具竞争力的交叉复合型人才，即“交叉复合类路径”；最后，学生还可通过选修就业创业课程、参与创新创业项目、接受“双师型”专家指导等，为今后走上职场或独立创业奠定基础，即“就业创业类路径”。

构建通识通修、学科专业、开放选修等多元课程模块。新建各类通识课程 272 门，制定 14 个通识类学分的毕业要求。以学科、专业基本知识架构和前沿发展趋势为基础，借鉴国外 80 余所一流大学培养方案，重构学科专业课程体系。新建学科前沿课、交叉课和就业创业课 162 门，为学生选择不同发展路径提供更多课程资源。将毕业总学分减至 150 左右，同时大幅降低必修课比例，保证学生的自主学习空间。

建立保障教学改革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机制。发布《新生学习指南》，完善导学机制，及时引导学生合理制定学业和职业规划。建立健全弹性学制、跨院系选课、缓修、缓考等适应个性化学习需求的配套管理制度。使拥有课程、专业、发展路径自主选择权的学生成为改革的主体和发动机，形成自下而上推动教师、院系和管理部门变革的动力机制，改变以往改革单纯依赖自上而下行政驱动的局面。

改革成效：“三三制”改革是本科教育领域系统性、综合性的改革，突破了以往只在“实验班”进行探索的形式，将范围拓展到全校、覆盖全体本科生，每年跨专业选课学生达 5000 余人次，跨院系准入志愿满足率超 80%，实现了受益面最大化的目标。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全球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学习经历调查”显示，南大学生“学术思维和表达能力”进步程度，经历“三三制”者显著优于未经历者；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等进步程度与伯克利无显著差异。

大连理工大学：建立基于大类招生的宽口径培养模式

试行按学科大类招生和培养。一是从现行按专业招生逐渐向按学科大类招生过渡。根据学校工科特点及优势，在机械、电信、土木水利和化工 4 个大学科下实施按大类培养。学生入校后，原则上一、二学年主要设置通识教育课程和学科大类基础课程，进行打通培养。第三学年开始设置专业课程，根据学生所选择的专业和方向，进行宽口径专业分流培养。二是构建与大类招生和培养相适应的课程体系。建立“通识课程”“大类课程”“专业课程”三大课程平台，其中“大类课程”占到总学分的 23%-31%。学生经过通识课程和大类课程学习后，根据自身志趣、潜质、爱好和特长，再确定专业及专业方向，从而摆脱“一考定终身”的发展局限。

改革成效：调查表明，实行按大类招生和培养以来，学生对所学专业的满意率、对学习环境的满意率、按时上课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改革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转专业不再是尖子生“特权”

本科生实现百分百自主选专业。学生至少有三次自主选择专业的机会：进校一年后，根据自己的兴趣，在全校范围内自主选择学院或学科类；二年级的春季学期可以参加由学校统一组织的中期分流，有接收条件的院系申报计划，由教务处统一公布，学生根据个人兴趣申请；二年级及更高年级的学生每学期均可个别申请转专业。针对少数同学因成绩等原因不能转到自己“钟情”专业的情况，实施“教学管理与学籍管理分离”政策，申请转专业未被接收的学生，只要修完意愿专业认定课程、达到毕业要求，即授予该专业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不受学生原学籍所在学科或专业限制。

三个“到位”保障转专业平衡有序。一是宣传到位。大一、大二下学期结束前，各院系以专题报告等形式向学生介绍专业详情，组织感兴趣的同学深入实验室和科研项目实地考察。二是课程改革到位。在低年级设置通修课程、学科群基础课程，分别占总学分的 45%、26%。即使跨学院、学科转专业，由于前两年课程安排差别不大，学生转入后补习难度降低，在技术层面上扫清了自由选择专业的障碍。三是指导到位。成立学生学业指导中心，由 25 位学业指导专家为转专业、跨学科交叉学习的学生进行专业方向指导，指导学生理性选择专业、开展个性化学习。由于配套措施到位，实行自由转专业以来，并未出现学生向某些热门专业过度集中、导致教学资源失衡的局面，学生转专业的选择越来越理性，各专业转入转出人数基本持平。

改革成效：自由选专业显著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展现出对人才培养的“加码”效应。以中国科大最高荣誉“郭沫若奖学金”获奖情况为例，2013 年 33 名获奖学生中，

有 9 名是转专业学生；2014 年 32 名获奖学生中，有 6 名是转专业学生。

中国农业大学：从“包办婚姻”到“自由恋爱”

转专业不设门槛、允许多次选择。凡是有转专业意向的一、二年级同学均可在每学期开学初提交转专业申请。报名者可选择两个学院、每个学院可选填两个专业志愿，不对转出专业作硬性规定。同时，允许学生多次转专业，已转过一次专业的同学可再次提出转专业申请。一、二年级两年下来，每人至少拥有5次转专业机会。“自由转专业”实施三年来，共有 1948 人提出申请，1288 人转入新专业，转专业成功率达 66%。

多措并举引导学生理性选择。一是开设新生研讨课，增强学生的专业自信。教学内容以所在学院为背景、以学科优势为特色，帮助学生全面客观了解学院、学科、专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增强认同感。二是推行大类招生，使学生有充分机会了解各专业特点。目前共设有 11 个大类招生、涵盖 33 个专业。学生入校后在专业大类学习 1 至 2 年，对专业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后，可以更有针对性地选专业。三是鼓励修读辅修学位、满足学生学习不同专业的需求。在人文经管类专业中，面向学有余力、但不转专业的学生设置辅修学位课程。

改革成效：“自由转专业”实施 3 年来，申请人数、转成人数及转成率逐年攀升。很多学生转到自己喜欢的专业后，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付出更多的努力，取得优异成绩。社会学专业学生陈慕龄，因为喜欢经济学转到了农业经济专业，获得国家奖学金 3 次、学习优秀一等奖学金 3 次，还被评为“北京市三好学生”。

（来源：教育部网站，2005-02-16）

清华大学：敞开创业课堂的大门

只要注册成为清华大学“学堂在线”的用户，就可以免费体验到由清华乃至全球顶尖名校的名师带来的 20 多门优质创业在线课程。这些课程，被归纳整合在该平台上一个名为“中国创业学院”的频道。

首期计划推出的课程中，不仅包括《设计思维》《社会创新》《创办新企业》等思维与技能类课程，也包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机械工程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等提供的多种产业领域和创业创新融合的学习课程，更有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知名院校的《创业 101 ：你的客户是谁？》等课程。

在实业家的眼中，新背景下的创业课程必须是开放的，要特别注重和世界的连接性。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井红说：“创业教育和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他知识可以通过传授、积累习得，但创业不行。它必须有广泛连接外界和前沿的内容，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开阔视野和思维。”

他更强调，创业者远非教育或几门课程就能塑造。“创业教育更重要的是实践。它还需要连接更多的资源，比如导师、投资人、孵化器的资源，只有把这些和课程连接在一起，才能产生真正有效的推力。”

[延伸阅读 1]

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不能再用“记工分”的方式评价创业教育

评价不能简单化：“不能以创业成败起伏简单衡量创业教育成效”

“社会上，经常有机构或者媒体以多少学生组成创业团队、取得多少融资、注册了几家公司等统计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在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看来，这是简单粗暴的“记工分”，“创业教育的效果不应单纯地以是否创办新企业来统计衡量，拿融资或者上市的公司数字来评价，不该以创业者阶段性的成功或者失败而论。同样在美国硅谷，有意义的失败在这里被推崇、被追捧，创业者们纷纷在公开场合分享自己的失败经历，以及从这些经历中学到的宝贵经验。”

杨斌认为，创业在中国要真正形成气候，实现大繁荣，需要依靠内生的热浪催生而成。为了加速并深化这种内生型创业活动，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营造非常关键，“创业教育天生具有开放性，大学创业教育的参与者应该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构成，要充分考虑投资家、创业前辈、科学家、教授、校友和在校生分别在创业教育生态系统中发挥的作用”。

导向不能功利化：“大学创业教育并不是要培养学生开公司”

“不要把教育划分为学习阶段和创业阶段，而是要创造条件实现这两个阶段之间的无缝切换。比如，有些创业经历也可以折算成满足培养方案的学分；建立弹性学制甚至打破学制来满足创业或学习的需要”，杨斌对此提出以上观点。

杨斌强调，一流大学的创业教育，并不是要培养学生创办公司。“一流大学开展创业教育，不是帮助学生开办公司缓解就业压力，更不是把学生都往商业这条路上引导。而是创造平台和机会，培养具有首创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创业者，这些创业者将来可以创办企业，也可能是创办社会公益事业，或者在大型组织中创造性地改变现状，实现创新突破。”

在他的观察中，走学术道路或者做公共服务，首创精神更是基本功。“不同行业，都需要创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创新创业的学术研究很多发生在商学院或者管理学院中，但创新创业教育不该是商学院或者管理学院的某种专才培养类型，而更该定位为通识内涵、发展多元的人才培养模式。”

[延伸阅读 2]

过去的创业教育走偏了吗?

从 2002 年教育部确立 9 所创业教育试点院校以来，我国创新创业教育已经走过了 13 个年头，但效果却令人担忧。

是高校过去的创业教育走偏了吗？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哪些？记者就此对话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李家华。

“培养乖孩子的传统教育教不出创新人才”

记者：目前大学生创业成功的积极性、成功率与 13 年前实施创业教育试点时的美好初衷显然并不匹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哪些？

李家华：从创业教育的角度来说，我国高校十几年来都没有建立一个科学的创业

教育体系。无论是教师、教材还是教法，都缺少一个系统的规划：创业教育的基本理论体系要靠外国舶来；各高校师资缺乏真正懂理论、知实践的师资，教法也还是以传统讲授为主。

长期以来，我们的应试教育一直在打磨学生的特点、培养他们的共性；只看卷面成绩的选拔方式也难以选拔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但创业恰恰是一种个性化的活动，培养乖孩子的应试教育是教不出创新人才的。

记者：您认为目前在创新创业上，中国学生最缺少的是什么？

李家华：中国学生真正最缺乏的是企业家精神。创业要具备三个要素：要有商机，要整合资源，要建立团队。现在的环境为大学生提供了充足的商机和资源，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却难以组建一个有共同价值观、构成能力互补、能共担风险的团队。这些都需要极强的企业家精神才能实现。创业教育最核心的是通过系列课程和实践，在他们身上注入企业家精神的基因，比如创新、冒险、团队、敬业。

“过去的创业教育培养了不少‘伪创业者’”

记者：以往很多大学的创业教育往往通过一些零散的创新课程或者创业大赛完成，这样效果好吗？有效的创新创业教育应该如何开展？

李家华：我去过很多学校，也当过不少所谓创业大赛的评委。我发现他们只舶来了皮毛，忽略了创业的内在精神。比如很多创业大赛，搞着搞着就成了“创业计划书大赛”“创业演讲比赛”，不少人抱着投机的心态去参赛，最终跟创业者渐行渐远。其实，创业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风险性、不可预计性非常强，这样的教育形态会固化很多东西，效果很差。

中国的创业教育要发展，必须做好创业教育的顶层设计。第一个层面是普及化教育，这可以通过公共课的形式进行，每个大学生都可以了解创业知识，对商业活动有初步的了解和认知。第二个层面是大众化教育，着重把创业教育的知识与专业融合，比如工科学生，缺少管理知识，加以训练可以激发他的创业潜质。第三个层面是创业的精英教育，针对那些将创业作为未来职业目标的学生进行特殊培养，这需要学校努力整合。

“封闭的孵化器只能培养温室里的花朵”

记者：现在，扶植大学生创业的呼声很高，应该如何营造好的创业环境？

李家华：创业离不开好的生态系统。这包括师生讨论、研讨的第一课堂，可以提供商业实践的校园环境和真刀实枪的大社会。但现在有个不好的倾向，我们给大学生提供的很多孵化器太封闭了，给他们免租金、免水电，学生的创业项目成了温室里的花朵，见光就死。

没有实战，很难培养真正的创业者。政府的资源和社会的资源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按照科学的方法培养创业者。在政策上，要科学、有效地制定更好的创业政策，特别强调政策的可持续性。学校要重点研究如何建立一个有利于大学生创立团队的平台，真正为创业提供人才支撑。

（作者：邓晖　来源:《光明日报》，2015-03-25）

◎ 高教视点 ◎

高校去行政化须防走歧路

熊丙奇：去行政化本质是行政专业化

近年来，在推进大学去行政化改革过程中，有一种反对声音是，难道去行政化要把行政管理也去掉，把所有行政人才都辞退？当然不是。去行政化并非不要行政管理和行政人员，而是要处理好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的关系，实现三者的分离，同时提高行政服务师生、落实教育和学术决策的效率。

简单地说，去行政化是要求学校行政职业化和专业化，大学行政领导不能再有行政级别，这当然不是去行政化的全部，但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不取消行政级别，那么对于校长的选拔、任命、管理，就很难摆脱“官员化”模式，这就是为什么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都提到要逐步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的原因。

笔者认为，要从职业角度对校长及行政人员提出要求，而不是将行政、教育、学术混为一谈。近年来，在教育部推进的校长公选中，已明确对校长提出要求“任职后能全身心投入学校管理工作”，这就是推进校长职业化。比如近期任命非院士出身的林建华担任北大校长，也是职业化的一种表现，因为以前选任北大清华等名校的校长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必须是“院士”，这并不符合校长职业化的要求。选拔校长要看其是否具备能胜任这一岗位的能力：懂教育、懂管理、有社会活动能力，而不应过分看重其学术能力。

在一些国家，学者担任校长之后，往往要遵照规定不能再从事学术研究，以避免分散精力，或者利用行政权去谋求学术利益。我国有的高校校长上任后，也公开承诺，任职期间不再申请学术课题，不申报奖项。但这还只是部分校长的个体行为，没有成为一项制度。有的高校在大学章程中明确规定，校领导不得担任学术委员会主席，并限制行政职能部门负责人在学术委员会的职位数，这是推进行政权、学术权分离的尝

试，但还不够彻底。

高校去行政化要求建立精简、高效的行政人员队伍。高校去行政化不是弱化行政，而是要提高行政效率。眼下，一些高校的行政机构臃肿、人员庞杂，行政力量一方面干涉学校教育和学术管理、评价，另一方面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去行政化之后，将对行政人员提出更高要求，从对上级领导负责转向为师生服务，从拖拉推诿变为提高执行力。行政人员的工作将接受全体师生的测评，如果师生对行政人员的工作不满，不要说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职位难保，就是校长也可能被投“不信任票”。

由此可见，高校去行政化是一个全面梳理高校管理体系的系统工程，要破除以行政主导，实行行政管理的体系，构建行政、教育、学术分而治之的现代治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行政人员的官员色彩将淡化，而职业化、专业化的色彩将突显。对学校来说，是从行政治校到教育家办学的过程，对于校长来说，是从官员走向教育家的过程。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姜朝晖：去行政化就是让高校回归学术

任何一种决策或制度的产生，我们首先要弄明白为谁服务的问题，即改革的服务对象一定要清晰。高校去行政化，也应遵循同样的逻辑，即我们为谁去行政化。

众所周知，在高校诸多的利益相关者中，学生无疑是核心，其次是教师，再就是学校管理和后勤人员以及学生家长、校友、社会、政府等。可以说，高校去行政化，就是为这些利益相关者去行政化，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大学的发展，促使大学生成人成才。

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那便是去行政化符合大学发展的规律，符合学术发展的诉求。追溯历史，从大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中世纪的大学，还是近代的大学，学术始终是大学的根基，大学的主要使命和责任就是探求新知，寻找真理，传承知识。其实，大学行政管理是 20 世纪初，现代大学发展到一定数量和规模才出现的，行政人员从教师中分化出来，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学术和教学工作。行政管理的出现，有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即便到了现在，行政依然是高校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但行政化的出现，却严重影响了大学生态。

笔者以为，目前我国高校去行政化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非常迫切。从行政化的表征来看，就是行政凌驾于学术之上，过度干扰高校学术自由。那么，去行政化就是改变这样一种状态，让行政服务学术，让高校回归学术。

在高校行政化的背景下，行政成了主导，学术反而沦为次要。稍有常识的人都清楚，学术才是大学的根本，行政只是辅助手段。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曾对大学有个

深刻的阐释："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并提出了"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可以说，从事教育的人，尤其是高校管理者，没有几个人不知道大学的本位所在，更明白教学、学术和行政孰轻孰重。但从现实情况来看，通常学术和行政交叉在一起，和个人或学校获取资源绑定在一起，让去行政化变得相当复杂，不仅关系个人名利，甚至关乎高校的发展。可以说，大学管理者同样是学校的利益相关者。许多人在做教师时，对大学行政化嫉恶如仇，然而一旦转为行政岗，一不小心就成了自己曾经厌恶的人。社会舆论提了许久的"去行政化"，学术界也进行了研究，教育主管部门也多次强调，但为何去不掉呢？症结可能就在于此，即在利益面前"忘记了为何而出发"。

总之，对于高校去行政化，不仅要厘清为什么的问题，更要厘清为谁的问题。要始终记着我们为何出发，为谁出发？笔者想起章开沅先生去年初请辞资深教授时的表态，"自己是既得利益者，要革自己的命。"他的这种壮士断腕的情怀，让人不禁肃然。也许，唯有如此，在构建高等教育现代化治理体系的进程中，我们才能让大学回归学术本位。（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博士）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5-03-10）

用科研敷衍教学比学术腐败更可怕

相较今天大学校园里的"青椒"（青年教师），50 多岁的张牧（化名）老师坦承自己是一个"异数"。

走过近 20 年副教授的漫漫长路，这位刚刚通过湖北省首批"教学为主型"教授评审的老师没有太多的激动，他更愿意大声疾呼：大学的首要任务便是育人，用科研去敷衍教学，比学术腐败更可怕，"不改革，受害的是新一代的大学生，毁掉的是国家的希望"。

在他看来，当前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从精英教育转到大众教育，一批学生在本科阶段没有好好学习，而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老师没有好好教。

张牧认为，今天的现实，不是一个老师就能改变的，需要所有的老师一起努力，尤其低年级的老师，"大学的习惯没有搞好，大学的基础没有打好，他就荒芜了"。

然而，在张牧的观察中，与自己当年读书时老师们全身心投入教学截然不同，今天的一些老师精力可能 80% 用在科研上了，20% 在教学上，"年轻老师的主要精力是写论文做课题，资深的老师要成为学校的旗帜出去拉课题拉项目。"

看过四川大学周鼎老师的《自白书》，张牧满是忧心，但对"青椒"也充满同情。

张牧介绍，从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每个不同的级别之间都相差 1000 ～ 2000 元的工资，而在青年教师群体中，买房买车结婚生子，解决职称待遇自然就成了首要问题，搞科研换钱也是大势所趋，"绝大多数老师都愿意好好教学生，但是绝大多数老

师都会被‘唯论文论’的指挥棒指到哪儿就会打到哪儿。”

校园里的天平越来越向科研倾斜。

张牧注意到，在学校评选高级职称的标准中，早前还要求教师在做科研的同时，教学考核必须达到优秀才有机会参评。而近些年，政策就转变为只要教学考核通过老师同学的打分便可参评，最后，全校所有的老师都通过了，“这样一来，教学考核便成了‘附赠品’”。

同样让张牧费解的是，所谓科研，就应该“顶天立地”，“要么有理论创新，要么能解决实际问题”，但实际上，由于大学教师职称评定与论文数量挂钩，买论文、在实验室中靠着几个数据做文章便成了常态，很多博士生都不免吐槽“想做的不能做，成天做这么些没有意义的东西”。

这位30年坚守在教学一线的老师期待湖北的职称改革推向全国，并形成一种气候，真正改变高等教育的一些现状，让更多高校把教学的权重提升到相应的位置上，“让更多的年轻老师回到教学的道路上，还科研一方净土，让孩子们不要成为政策的受害者。”

（作者：雷宇，韩天伟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5-02-09）

访李培根教授：大学教育最高境界是心灵的抵达

教育是在不断改革中发展的
面临挑战、存在问题，并非现在的教育所独有，而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未停止过教育改革的步伐，几乎每一所高校都在进行改革。您认为高等教育改革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李培根：在谈到高等教育改革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考虑这样几个问题。

教育改革——道耶？术耶？教育改革要避免失去灵魂的改革，这是我们最关键的问题。哈瑞·刘易斯认为，哈佛追求的卓越是失去灵魂的卓越，在科学研究上的确是卓越的，但在把年轻人培养成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这一点上做得还很不够。改革中若忘记了教育之道，只是致力于教育之术，则是失去灵魂的改革。

教育宗旨——器耶？人耶？孔子讲，“君子不器”。其实“君子不器”可以从两方面讲，一个是不器己，一个是不器人。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工具，特别是教育者，既不要把自己看成是教书的工具，也不能把学生培养成工具。当前，我们的教育宗旨是建立在对教育工具意义上的理解，而不是建立在对人的意义上的理解。

社会责任——服务耶？引领耶？大学的一个重要社会责任是服务，但大学的引领

作用更重要。哈佛大学前校长福斯特说："大学的本质是对过去和未来负有独一无二的责任——而不是完全或者是哪怕是主要对当下负责。"我们今天的教育似乎主要是对当下负责。大学应该服务社会，但大学不能仅仅是社会的风向标，而应该是社会发展的发动机。尤其是一流大学，应能引领科技发展、社会思想和文化的进步。

记者：当今我国教育改革的重点在哪里？

李培根：我们应该承认今天的教育还存在不少问题。我个人认为，教育改革的重点应该是"人本"教育。《共产党宣言》里面说："……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仅仅强调人的自由发展，而且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的这些话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教育说的，但对教育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记者：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进行教育改革。人们如何看待教育改革？

李培根：教育改革并不是某个时代、某个国家的专利，人类教育正是在持续不断的改革中获得发展、进步的。

很多有识之士都在反思时代教育问题。比如，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也曾深刻反省和批评当时的教育："今天，单个的教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一个自我牺牲的人，但是，由于缺乏一个整体的支撑，他实际上仍是软弱无力的……一种尝试迅速地为另一种尝试所取代。教育的内容、目标和方法不时地被改变。"

这说明，面临挑战、存在问题，并非现在的教育所独有。关键是要正视问题，科学地分析、研究问题，从而提出有效解决方案。国家层面的、正确的教育理念非常重要，那是对整个国家教育宗旨的宏观指导。至于具体的教育改革方案，政府不宜过多干预，应给予大学充分的自主权。

教育活动的主体是学生
教育要晓喻人们让精神充盈人生，与"你"相遇

记者：您认为大学教育应该以教师为中心还是以学生为中心？

李培根：我认为，大学教育应该以学生为中心，教育活动的主体是学生，教师是主导。真正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体现的是教育者的人文情怀。

教师可能会说，这不是弱化了教师的作用吗？我觉得，越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恰恰越是有弱化教师的作用。目前，我们的教育多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形式，即我教什么，你学什么。如果教育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就要依据学生的情况进行教学，最基本的莫过于在课堂上与学生互动。有时候，学生的问题对教师是挑战。对教师的挑战越大，教师的作用也越大，也越难以做到。总而言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就是

要尽可能地引导学生主动学习、主动实践，让学生更好地成为他们自己。

记者：那么教师应该怎样发挥引导作用呢？

李培根：这里，要思考一个问题：入世为师——征服耶？适应耶？

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奠基人、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是理性。学者何爱国认为，西方的理性主义以“入世而不属世”为特征，与现实世界保持着一种高度紧张的对抗和征服关系，即“理性的征服”。这实际上是批判精神。东方的理性主义，比如儒教，特点是“入世而属世”，即“理性地适应”现实世界。

我认为，教育中“理性的征服”和“理性的适应”都需要。但中国大学教育中非常欠缺的恰恰是批判精神。大学以及大学教师对社会最重要的作用是引领作用。为了实现这种引领作用，教师首先要有批判精神，同时也要引导、启发学生，让学生具有批判性思维，这对他们的成长是大有好处的。

记者：您怎样定位大学教师与学生的关系？

李培根：哲学家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中将人与人的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我与你”，一种是“我与它”。他赞成“我与你”的关系，不赞成“我与它”的关系。

“我与它”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当我带着预期和目的去和一个对象建立关系时，这个关系即是我与它的关系。不管那预期或目的看起来是多么美好，这都是我与它的关系，因这个人没被我当作和我一样的存在看待，他在我面前沦为了我实现预期和目的的工具。”这是马丁·布伯所不推崇的。

“我与你”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马丁·布伯谈到教育时说：“教育的目的非是告知后人存在什么或必会存在什么，而是晓喻他们如何让精神充盈人生，如何与‘你’相遇。真正的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便是这种‘我与你’关系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教师一定要把学生看作一种真实的存在、神性的存在，而不能只是看成教师职业生涯的一种工具。要把学生视为伙伴而与之相遇，根据对方的一切因素来体会这种关系。

把思维带到从未抵达的地方
最高的境界不是知识的抵达，而是心灵的抵达

记者：您认为大学生怎样理解学习的目的，什么样的学习是真正的学习？

李培根：真正的学习就是要不断地去完善自己，更好地成为你自己。具体细化为完善人格、树立崇高理想、培养看问题的视野、关心社会和未来等方面。

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中，培养完善人格是很重要的。大学生在毕业后不能仅仅成为一位专家，还要成为一个和谐的人。完善人格的关键是要懂得人的意义，具备正确的价值取向以及对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责任等的认识。当然，不仅要认识自己的尊严、权利等，还要尊重别人的尊严、权利。

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代青年，应该是真正社会意义、政治意义上的青年，应该有理想。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中说，“哈佛大学是否鼓励他的老师去研究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哈佛学生是否从全球的那些极端的贫穷中学到了什么……”大学生要有社会责任感，有担当。所以，同学们在理想与现实方面，既承认现实有不足，又恰恰因为现实有问题，更有责任去改善它。一个人的力量很微小，如果所有人都有这个意识，就会逐步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记者：经过几年大学生活，大学生最应该收获的是什么？

李培根：现在很多大学的教育以就业为目的，一些学生的学习也是以就业为目的。这个层次是很低的。大学教育的最高境界，不是知识的抵达，不是就业的抵达，而是心灵的抵达。

记者：这样的教育就是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吗？

李培根：谈到博雅教育，有些人把博雅教育看作通识教育，有些人把博雅教育理解成创新教育，也有一些人具体理解为书院教育。澳门大学全球事务总监兼校长特别助理冯达旋先生说，奥摩姆（Ollmom）博士曾告诉他，“把你的思维带到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对这句话的另外一种理解是，要从大学教育中获得心灵的自由，而不是只学到一些知识。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崔琦曾在奥古斯塔纳学院读书，他说：“在此大学，我能自由自在以我个人的速度阅读、学习及思考。”“自由自在”是说处于一种心灵自由的状态。所以，冯达旋先生说：“‘博雅’不只是行动，不只是课程，不只是学习过程，最主要的是一种‘心灵的思维’。”

记者：在您看来，真正学习好的标志是什么？

李培根：严复有一段话：“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中国人认为懂得的东西越多越好，学到的东西越多越好，而西方人尊崇新知，即新的发现、创造或创新。今天我国政府和大学都很强调创新，但大学教师做研究真正凭好奇心驱动的很少，而好奇心更能驱动创新。另外，我认为，“创新教育不是奢侈品”。创新教育不只是重点大学的事情，也是高职、中专、技校的事情，它们也有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技能。同样，创新教育也不只是优秀学生的事情，每一个大学生都有创新潜能，只不过很多学生的潜能还没有发挥出来罢了。

记者：大学生应具备怎样的看问题的视野？

李培根：这涉及“知识视野”和“问题视野”哪个更重要的问题。我认为问题视野比知识视野更重要。问题视野就是要发现问题，即使不能发现新问题，也要善于观察问题、关注问题，这是一种很好的素养，也是一种能力。仅满足于教师教给我们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聪明的学生要去关注问题，尤其是那些大问题，包括社会的、科技的问题。

（作者：杨桂青，苏文师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5-03-04）

◎ 理论探索 ◎

杨宗凯：高校如何优化资源配置

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是高校提升办学质量、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必由之路。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头绪多、任务重，只有在重点问题和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才能带动全局工作的开展。其中至关重要的“牛鼻子”就是资源配置。以资源配置为核心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不仅可以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实现资源最佳开发利用，还能够形成管长远、可持续的高校治理体系。

优化外部资源配置以释放活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涉及政府与高校的关系、社会与高校的关系以及高校内部的关系。优化外部资源配置，就是要通过对管理模式、评价方式、投入措施等的调整，建立“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广泛参与、高校自主办学”的管、办、评相对分离又相互支持的现代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一是加快简政放权。简政放权的主体不应限于教育行政部门，政府人事、财政等部门都应清理涉及高等教育的行政审批事项，出台权力清单、负面清单，明确权力边界，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如在高校评估上，可以第三方评价、同行评价为主，并尝试引入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推进专业评价。二是统筹整合专项资金和各项检查。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仍掌握着大量资源，习惯于通过专项资金、项目、工程、评奖等方式影响高校发展。应统筹整合各类专项资金，对一些项目和工程实行公开招标、自由竞争。扩大高校资金统筹使用权，提高资金使用整体效益。同时，探索综合评估检查方式，整合各种常规性和临时性检查，定期就高校办学的相关问题进行综合考评。三是优化配置后勤资源。高校应逐步剥离不属于自己的职责，集中资源做大做强主业，发挥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功能。充分发挥市场在后勤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以后勤服务社会化、专业化、现代化为目标，按照事企分开、管办分离、主体多元的原则，理顺高校后勤管理制度，构建后勤服务保障大系统，完善公益性投入与市场化运营相结合的后勤运行机制，为高校提供坚实办学保障。

优化校内资源配置以增强动力。一是增强学院发展动力。高校人、财、物应更多地向学院倾斜，给学院更大的资源配置权和发展空间。有条件的高校可以从财务管理开始，逐步实施校院两级管理，以权责划分为核心整合优化教育教学资源。学校对学院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以考核评估为主要方式管理学院工作，以发展规划和资源配置为主要手段引导学院工作，以监督制约为主要途径规范学院管理权力的使用。通过学校分权和管理重心下移，转变学校部门的管理职能，明晰学院办学主体地位，形成

学校宏观决策、部门协调配合、学院实体运行的管理模式，提高整体办学水平和效益。二是积极构建现代大学治理模式。高校应以制定章程为契机，明确校内各种权力运行规则，形成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治理体制，使高校治理紧紧围绕学校发展目标运行，各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构建行之有效的现代大学治理模式。华中师范大学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制定“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和“两会议事规则”等，对构建现代大学治理模式进行了积极尝试。三是以信息化推进管理现代化。对信息资源的掌控和利用能力日益成为影响高校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高校应加快管理信息化进程，按照应用驱动、需求导向的原则，整合校内各种管理信息资源，规范数据采集与管理流程，建立事务处理、业务监管、动态监测、评估评价、决策分析等教育管理信息系统。支持师生参与学校内部质量保障与评价机制建设，支持学校服务与管理流程的优化和再造，为各项改革提供大数据支撑，提高决策水平、管理效率，推进管理现代化。

（来源:《人民日报》，2015-03-07）

大学如何告别平庸

结构失衡和理性失范——中国大学治理的现实困境

任何一个组织都存在治理问题。自 1995 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我们的全球伙伴》报告进一步明确“治理”的内涵以来，治理的问题就成为社会管理领域极其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在普遍意义上，治理就是当机构面临市场和政府双重失效的情况下，作为一种权力制衡和决策机制，调和各方冲突，以增进公共利益的方式。大学作为一种非营利性的公共机构，大学治理应关心这样几个问题：一所大学何以存在？它需要一种怎样的特殊制度安排来最大限度地保证其自身价值和理念的实现？因而，大学治理需要向我们描绘的是这样一幅图景：在整体上构架出大学内外各利益主体的关系框架，并勾勒出大学面向未来与现实可能性之间的目标愿景、行为原则、决策方式、权力配置等结构的远景规划以及实现过程。

近些年来，我国大学机构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结构失衡和理性失范问题：作为独立法人实体的合理身份并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落实，政体、国体与大学权力配置和内部关系结构并未真正意义上理顺，教授治学在整个大学治理结构中的主动权并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发掘。这些问题使得一些大学日益失去学术殿堂的功能，日渐平庸化，向行政机关靠拢。在这些批评与质疑的声音中，最让人尴尬的显然是在建立、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的背景下，人们极力倡导的教授治学、学术自由、扩大办学

自主权不仅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活力，反而在片面追求学术知识的外在功用，尤其是偏重政治功用与经济功用的驱使下，出现了严重的行政化与企业化倾向，甚至是权力崇拜与市场崇拜的价值倾向。

首先是校园内外行政权力对大学事务的任性与专横、强势话语权以及某些大学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无视和丧失学术组织基本的道德良知与伦理价值，导致权力倒错、主体倒错、价值倒错、伪劣现象、资源浪费等积弊。其次是经济主义的强大诱惑力使某些大学由“以学术为志业”转变为“以经济追求为鹄的”，对学术资本的强烈追捧取代了对学术职业的精心呵护，拜金主义成为大学处理自身及其与外部关系的最强话语特征。比如，在日常生活中常提到的大学越来越像“衙门”，越来越像“企业”，校院领导越来越像“老板”，就真切地反映了人们对大学行政化和经济化现象发自心底的厌恶。此外，广泛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无形中对以上两种倾向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它主张感性、体验与非理性，排斥目的、价值与意义，从哲学高度论证并强化着大学对于当下、眼前、即时、短期、现实利益的追求。显然，这种理性失范行为正是导致中国大学治理陷入困局和僵局的根源。

明确关系结构，强化教授治学——构建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的核心

大学治理涉及很多问题，单纯的技术或制度显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它的本质。最核心的问题是谁来控制大学，或者说由谁主导大学发展。在大学作为行会而诞生和发展的早期，“先生大学”完胜“学生大学”，显示了教师在大学的独特作用，成为今天大学发展的主流，表明只有教师才是大学的主体和核心。因为只有教师才能完成大学最基本的功能：创造知识、传授知识和传承文明，而任何其他功能与机构设置都只能是衍生的外在性工具和派生性需求。因此，大学治理需要进一步落实的问题就是选择最合适的人成为大学教师，即甄别、选拔和激励大学教师。这说明，只有充分发挥大学教师的主体作用，才能真正实现有效治理。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在由大学体制结构所引发的问题里面，最根本的是体制结构之内人的位置问题。对于大学的生存来说，最关键的是它要依靠人，而非制度，因为制度说到底不过就是一个特质前提而已。”在治理制度与大学教师之间，大学教师是更为主动的积极的核心因素，制度只不过是大学教师实现某种理念的过程与工具。

在大学思想史上，大学教师到底是管理大学一切事务还是仅限于重要的学术事务，这是一个重要的争议性话题。现代大学已经由一个目标单一的、根本利益一致的单纯学术机构演变成为一个目标多元、根本利益相互冲突的巨型跨国企业，如果我们仍然囿于传统的教授完全掌管一切事物的治理机制，显然已与当前现实格格不入，相去甚远。教授治校起源于中世纪学者自治，曾经一直作为西方大学治理传统。然而，当大

学组织从一个学术行政一体化的微缩景观发展为一个国际化巨型机构时，人们发现让教授既充当专业权威，又作为管理人员，已是力不从心。日常运行与国际竞争让大量行政人员和庞大官僚体系渗透并执掌了大学，治校权力逐渐成为不同主体、多种权力激烈博弈的重要筹码。

从常识意义上讲，教授会、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大学自治、董事会、理事会、评议会、大学章程等是具有极强西方大学制度特点的话语体系；而党委常委会、校长负责制、办学自主权、教授治学、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话语概念。现代大学虽然起源于西方，现在却已成为世界文明的共同财富，我国在学习、借鉴西方现代大学治理基本概念、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同样亟须步入大学治理的“中国时代”。

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要求“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领域和发动机，大学必须率先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建立既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现代大学发展趋势的现代大学制度成为我国大学改革与发展最重要也是最艰巨的系统工程。正如《教育规划纲要》第四十条所明确要求的“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公办高等学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这显然是第一次以政策文本形式表明，作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治理体系要特别重视“大学、政府、市场”和“书记、校长、教授”之间关系结构、权力配置、互动机制等因素，淡化教授治校概念之争，努力探索教授治学有效途径，这样才能既充分保证特定政体国体与大学权力结构之间的匹配，又明确呵护教师参与大学治理的良好意愿，尽可能发挥他们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

重铸大学的主体理性——中国特色大学治理体系的根本路径

大学治理体系是一个集普遍性、复杂性、敏感性、民族性、发展性诸多特点于一身的系统工程，指望一经推出就能解决我国大学的诸多棘手问题和现实难题，是非常不现实的。就当前我国大学如何看待自身和处理自身与外部种种关系而言，存在着理性发展的先天不足，导致自身的公共价值和人文精神难以充分彰显。我国社会及其各类主体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经历理性化的完整历程。因此，我国大学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汇、融通与较量当中，已有的大学理性不足以引领自身及其社会而起主导作用，不得不退居于从属乃至附庸的地位。对此，社会和大学都需要反省。事实上，中国社会甚至整个人类社会到现在

为止，并未完全实现启蒙运动的思想目标，进步、合理性、意义、价值等社会理念仍然尚未完全展开或充分实现。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总是迷信制度，以为制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其实，制度并非万能，尤其是在人们内心深处还极其缺乏对制度价值和理性精神的充分尊重和认可的情况下。因此，要真正建立、健全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就必须重铸大学主体人格，重建大学理性精神，大学才能真正成为充分独立的法人组织，才能处理好自身及其与外部之间的多种复杂关系。只有大学拥有了理性的独立人格，才能充分利用法人主体地位和办学自主权，学会与政府、市场以及社会其他组织的合法、平等和正常交往。这实质就是大学的主体理性，它既涵括了大学的主体间性，又指大学的交往理性。所谓大学的主体理性只有在开放社会各主体间的理性交往中，互相承认、友好相处、相互尊重的情形下才可能真正存在。

中国大学建立时间短，中间历经曲折反复，没有经历完整的社会除魅阶段与理智化启蒙，因此重铸主体理性将是一个漫长的、艰辛的、曲折的发展历程。这里大概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健全大学治理体系的前提是所有大学必须取得独立的法人和主体地位，充分享受合法的办学自主权，是独立的高等教育实践主体；第二，在今天既定“教授治学”背景下讨论谁来控制大学，显然只有大学教师具备了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和理性精神才能真正成长为大学治理的核心，才能坦然面对“给教授搬凳子”的行政领导，毫不畏惧，理直气壮，最终才有可能心无旁骛从事寂寞的科学研究、烦琐的教书育人和中立的学术决策。

总之，只有这种大学治理模式才能以实体化形式真正实践以教授为主体组建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学术组织，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大学治理的困局与难题，即强化大学党委的政治领导能力建设，制约各级行政管理者的行政权力泛化，重铸大学教师的主体理性，最终承担起培养国家和民族发展所需杰出人才的任务和责任。

（作者：张学文　来源:《光明日报》，2015-04-07）

◎ 经典重温 ◎

资中筠：大学文科向何处去

前些时，清华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建院十周年，有幸应邀得与盛会，到会场后方知被列入来宾致词名单。仓促无备，只得硬着头皮信口开河。但是河口既开，随之流淌出来的都是我平时对人文教育的看法，在那种场合有些不合时宜。当时限于时间，而且毕竟是庆典，有些言犹未尽，本文在讲话基础上略有补充。

我很荣幸应邀参加盛会，首先表示祝贺。李伯重教授要我讲话，盛情难却，只得信口开河，杂乱无章请大家原谅。刚才讲话的诸位都是各方面的代表。我谁也不代表，只是一名老校友，如果有一点特点，就是 1951 年毕业，是清华文学院最后一届文科毕业生，1952 年院系调整，清华文、法、理学院都没有了，原来的文学院同学变成了北大毕业生，直到十年以前又重建人文社会科学院，中间隔了 40 年。

前几位讲话中多次提到当年清华人文荟萃，提到国学研究所“四大导师”，还有朱自清、闻一多等等。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我现在不免怀旧一番，想起当年我在校时亲历的情景。那时文学院院长是冯友兰、法学院院长是陈岱荪（文科与社会科学是分开的，社会科学属于法学院）。现在看到写陈岱荪先生的文章多形容他是温和长者，而当时他是以厉害出名的，据说他给学生 59 分，再怎么求情，决不加一分使其及格。此说也许是传闻夸大，但是老清华严进严出不止一个系。有些系到毕业时只“刷”剩三分之一。图书馆馆长是潘光旦教授兼，当时图书馆馆长多为名教授，但他决不是挂名，连什么书出借最多他都去查，以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

我是 1948 年大二从燕京转入清华的，只上了本科，不像诸位有硕士、博士学位。但是回想起来，当时给本科生开课的多为名教授。我上的是外文系，必修的公共课“世界通史”是雷海宗教，“西洋哲学史”是邓以蛰。这两位先生现在可能知道的人不太多，但都是本界的权威。雷先生应该算史学界一代宗师，只是解放后他的史学观点与主流不合，还有种种历史原因，没有等到反右就落难。院系调整后他不能到北大，去了天津南开大学。结果南开历史系获益匪浅，成为南开文科中一强项，在全国大学历史系中也名列前茅。至今南开的老教师还提到雷先生为学科建设打下的基础。他去世较早，没有赶上改革开放，所以名声不显。近年来他的著作得以出版，南开举行了纪念他的研讨会，关于他的文章也见诸刊物，说明史学界没有忘记他。我上他的课印象最深的是他记性特别好，一上来先在黑板上写几个本堂课要讲的重大事件的年代，同时再写上相当于中国历史上什么年代，例如：公元前 xxx 年，古希腊发生什么事，相

当于鲁哀公多少年，等等。他讲的具体情节我忘记了，但这种思维方式一直对我影响很深，就是把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联系起来考虑，每当提到外国历史事件时，本能地就想到当时中国是怎样的状况。邓以蛰先生在当时被认为是美学权威，与朱光潜齐名，他解放以后也未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发挥。可能他的儿子更知名，即两弹一星的元勋之一邓稼先。我着重提这两位是因为他们现在不大知名，在座的可能知道他们的就不多。另外我的专业课，“西洋文学史”是钱锺书教，“英国小说”是杨绛，这两位先生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讲。钱先生讲课更是信手拈来中西贯通，受他的影响我的毕业论文选了比较文学类的题目，导师也是钱先生。教莎士比亚、英诗和英国散文的是美国人温德，他从1930年代来华一生都在中国教学：清华、西南联大、清华、北大，最后在北大去世，好像是101岁。其他的老师因时间关系就不多介绍了。这些教授上课的共同点，就是没有讲义，全是源源不断从脑子里流淌出来，听课完全是享受，不会想逃课。而且也不能逃，因为考试全凭自己的笔记以及从专心听课中启发出来的悟性。现在听说有点资历的教授都不愿意开本科生的课，回头来看，我当时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视为当然，不以为意。

我还要提到梅贻琦校长。现在蔡元培的地位已经确立了，这当然是不容置疑的。梅校长主持清华时间最长，并且历经抗战迁校和战后复校的艰难时期，对清华的贡献功不可没。他的办学理念其实与蔡元培是一致的。现在大家都知道他的一句名言：“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光是这句话的精神，现在就很难贯彻。但是他还有一些话，人们不太知道，就是学校的主体就是老师和学生，其他人员，包括校长，都是为“教”与“学”服务的，比如上课需要教室、桌椅板凳、图书仪器等等，就需要有人为其服务。其实校长所管的当然不止这些，单以请这么多好老师一项，就体现了何等眼力和气度！的确，梅校长在学校一直低姿态，很少出面作指导性报告。我们只记得某某教授讲过什么，却不记得梅校长讲过什么话。可以说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清华四十年代末学生运动高涨，地下党很活跃，左派思想占上风，因此有“解放区”之称。梅校长在保护学生不受国民党军警迫害方面也默默出了不少力。他曾经坚拒包围学校的军警进校抓人。尤为难得的是，他当然知道这些进步学生的政治背景，与他本人的政治信仰是不同的。但是他信奉思想自由，维护校园的神圣不可侵犯，并且以保护学生为己任，仅此三条，他够得上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

这样的阵容，这样的传统，到1952年一下子就把文科（包括法学院）给砍掉了。怎不令人痛心疾首！否则清华何至于到2003年才纪念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建院十周年？当然，砍掉的不止是清华的文科，那些年所有人文和社会科学的遭遇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说。如今清华经过多少有识之士的努力，又重建了这个学院，而且不断壮大发展，十载于今，当然是大好事，值得庆贺。

现在清华把人文与社会科学放在一起。其实，二者有所不同。后者更加紧密联系现实，如经济、社会、法律、政治，比较能直接为当前现实服务。而人文则不那么实用，而且不应该那么实用。现在一提到某个学科或某项研究课题，最常出现的问题是“有什么用？”以这个标准来衡量，那么这次会上不断提到的那些清华引以为骄傲的大师们所做的学问，或赖以成名的著作，都经不起一问。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钱锺书的《管锥编》既不能产生经济效益，也不能对领导人决策提供参考，如果现在申请课题大半得不到批准，何况这些都是毕生积累的成果，不可能限期完成，限期“结项”。还有许多大师并不著作等身。以现在的量化标准，他们有些人可能评不上高级职称。当然，更重要的是谁来评他们？现在文科已经没有了学术权威，就只好用行政手段，由行政官员订规则。对他们而言，可以摸得着的只有表面的、形式的、可以量化的东西。所以要真正发展人文学科，不能实用主义，急功近利。对于有用无用的问题，恐怕需要从更为长远的、精神层面的、全民族的，乃至全人类文明的角度来考虑。

刚才有位先生提到方今最高领导，有多少位政治局委员都是清华毕业生。他并为他们都是工科出身而不满足，希望文科将来也出这样的大人物。清华出高官，似乎是近年来为人瞩目的一个现象，也是不少清华人引以自豪之事，我就听到过清华的老师向外人历数出自清华的国家领导人，而且还有多少部级以上官员，说明清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云云。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官大多是理工科出生，主要还是工科，这有我国特殊的历史原因，姑且不论。但是高等学府把办学目标定位在出高官，恐怕是本末倒置。那除了高官还有大款呢！不知有没有统计，我想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富出自清华的大约也不在少数。名牌大学之为“名牌”是靠出高官巨富呢，还是靠学术水平？如果一位教师课堂上所有的学生都以此为“高山仰止”的目标，“虽不能至，亦当望之”，也就是人人都心中奔升官发财，那课还能上得下去吗？这是极而言之。不过近年来清华正巧出现这一特殊现象，给师生造成一种导向也是事实，恐怕不一定有助于学术繁荣。社会需要各种人才，优秀的大学培养各类优秀人才，其中也可能有人做了高官，有人经商致富，但其他的道路还宽广得很。特别是文科，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出“大儒”。而要达到这一目标，恰巧需要有抵挡名利诱惑的定力，在方今之世是很难做到的。惟其难，才需要下大力气提倡。有幸进入这一殿堂的莘莘学子，一进来就听到这么多大师、硕儒的名字，我想总会有人以他们为“高山仰止”的目标的。我祝清华人文学院继承老清华的人文传统，多出几位大儒。

最后，谈一点国际交流。清华最初是留美预备学校，与美国的渊源较深。改革开放以后是国际学术交流重镇之一，除了历史原因，还有现实原因，自然与美国交流最多。当然美国经费来源最充足，高科技也最先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文科而言，

西方文化的源头还在欧洲，底蕴最厚，美国的人文学科也来自欧洲。就是在今天，文、史、哲方面的前沿也不在美国。所以我认为还应多关注一些不那么热闹的欧洲的学术界，多开展一些与欧洲的交流。另外，前面所提到的高度实用主义、急功近利都是美国的特点，他们战后还有一个特点是学术政治化。以至于我国一提起人文社会科学就与“思想库”等同起来，这与美国的影响有关。但是美国的“思想库”涉及领域甚广，其成果多面对公众，不一定面对政府，而且不同派别和观点争鸣不断，此消彼长，这又是我国学不来的。所以学美国“思想库”，也仅能得其末。在人文方面的学术交流中，不是只盯着美国，而把目光放宽一些，收获会更大。

以上讲话在谈到出大官与出大儒一段时，台下报以笑声和掌声，可见还是有人认同的。最近又见报刊炒作耶鲁大学出了多少位总统以及总统候选人。真是推己及人，把读书做官论推广到了外国大学。这样的导向，不知要把高等教育引向何方？

现在清华把人文与社会科学放在一起。其实，二者有所不同。后者更加紧密联系现实，如经济、社会、法律、政治，比较能直接为当前现实服务。而人文则不那么实用，而且不应该那么实用。

要真正发展人文学科，不能实用主义，急功近利。对于有用无用的问题，恐怕需要从更为长远的、精神层面的、全民族的，乃至全人类文明的角度来考虑。

（来源:《新华文摘》，2004 年第 11 期）